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王祖珍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

ZhongRi Guanxishi Lunwenj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 8/16·字数 268,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统一书号：11093·131

定价：1.35元

前 言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于1982年8月9日至1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了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二十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各地史学工作者向这次讨论会提交了七十六篇论文和资料。这些论文和资料内容丰富，题目广泛，其学术水平在前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它不仅对中日关系史，而且对中国史和日本史的研究都是颇有价值的。因此，将其中一部分论文汇集成书，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惯例”。由于分别在辽宁、吉林召开的第一、二次学术讨论会选出的论文已先后编辑出版了《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和第二辑，所以，这次学术讨论会选出的论文编为第三辑。

本辑收入的二十三篇论文是经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学术组评选，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赵连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历史系刘恩格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培林三位同志负责组稿、编辑的。遵照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们尊重作者的观点，保持文章的结构和风格，只是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加工和修改，而没有大的改动。当然，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和差错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王金林 赵健民 (1)

中国古代天文历算科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田久川 (18)

从渤海与日本交聘看唐代东北地区与日本的

经济交流……………任鸿章 (33)

也谈以勘合为中心的明日关系……………冯兴盛 (54)

试论郑氏与日本的贸易关系……………徐恭生 (66)

小仓城与黄檗文化……………于植元 (82)

孙中山与日本明治维新……………王 弋 (99)

近代甲午以前的对日研究与文化交往……………吕万和 (113)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与大陆市场的关系……………米庆余 (127)

甲午中日战争与光绪帝……………孙孝恩 (137)

论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苏贵民 (152)

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与日本……………李吉奎 (169)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
主义”……………赵矢元 (183)

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日贸易

……………孙克复 姚玉民 (195)

从《东洋经济新报》看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对华政策观……………熊达云 (221)

石桥湛山与中国……………易显石 (237)

田中义一及其对华侵略的“积极政策”……………赵连泰 (252)

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 1927 年中国大革命	沈 予 (264)
1905—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大连港对中 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关捷 魏然 (285)
满铁系统“关系公司”剖析	苏崇民 (304)
关于马占山一度降日问题	于德有 邓 鹏 (322)
松村谦三和当代中日关系	冯瑞云 (335)
曲折的道路 坎坷的历程 ——战后中日贸易三十年	高 晶 (350)

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

王金林 赵健民

古代中日关系，从文字记载的东汉算起，至明清之季，大约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若依据考古资料，则可追溯到更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日两国的关系，主流是好的，但也有过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战争。

所谓古代中日间的三次战争，即是指：（一）公元 663 年，唐朝与朝鲜新罗联军，同日军在朝鲜白村江口的战争；（二）公元 1274 年及 1281 年，元朝忽必烈两次发兵进犯日本；（三）公元 1592 年及 1597 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朝战争。

今年是中日复交十周年。为加强中日友好，发展中日关系，回顾一下古代中日之间三次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次战争都发生在战争发动国的 重大历史转折时期

对外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虽然发动的时间不同，主动出击的国家也不一样，但有着共同点，即都发生在战争发动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

第一次战争，即白村江战役，是由日本发动的。当时日本正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大化改新。645 年 6 月。以中大兄皇子为首

的贵族集团，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取朝廷大权，宣布废止皇室、豪族的田庄和部曲，全部成为“公地公民”，原拥有私有土地和部民的贵族，成为领取“食封”的官僚；废除族长贵族的政治制度，树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仿效唐代的均田令，实行班田法和租庸调制等。但是，大化革新推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受到旧势力的反扑和破坏，也受到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抵制。在革新派内部也发生过猜疑和分裂。反对派曾利用朝庭营建宫室，大兴土木事，指责革新事业，说“天皇所治政事有三失矣。大起仓库，积聚民财一也；长穿渠水，损费公粮二也；于舟载石，运积为丘三也。”^①公元658年11月，发生了有间皇子的谋反事件。在此期间，反对派还离间革新派的团结。革新政变的有功之臣，大化新政权的首任右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就是因为遭人诬告、遭受到中大兄皇子杀害的。处于这种局势之下，要巩固新政权的统治，贯彻改新措施，其任务确是相当艰巨的。中大兄皇子面临这样的形势，贸然干预朝鲜半岛诸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纠葛，终于导致了白村江战役的爆发。

第二次战争，始自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以后的第三年。当时，忽必烈的处境甚恶。自他即位后不久，他的弟弟阿里孛哥受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拥戴，宣布为大汗的继承人。自此兄弟二人展开了四年之久的内讧。阿里孛哥被平定后，守旧的蒙古贵族又在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领导下，与忽必烈进行长达三十年的抗争。这样，忽必烈受到了偏安临安（杭州）的南宋和海都大汗的腹背夹击。与此同时，在忽必烈统治区域内，不时发生汉人的反抗。如1262年，发生了归降元朝的汉族将军李璮的反叛。这次反叛是得到南宋支持的。它使忽必烈感到南宋存在的危险性，便着手筹备武力南侵。公元1269年4月，忽必烈曾对高丽王的使者说：“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兵，

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②，并开始调查朝鲜半岛至南宋和日本的海道。在忽必烈看来，从半岛至南宋、日本是极容易的事情，他曾对高丽使者说过：“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岂不可行乎？”^③可是，因受背后海都大汗的牵制，忽必烈对南宋不敢轻举妄动。就在这种处境下，他开始遣使“招抚”日本。自1268年到第一次侵日战争发生前，六次派使臣到达日本。因其国书言辞蛮横，皆遭镰仓幕府的拒绝，甚至使者被杀，忽必烈决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日战争。

日本自十五世纪六十年代起，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经过一百二十余年的纷战，直至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总算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当时，摆在关白丰臣秀吉面前的严重课题，是如何巩固刚刚实现的统一。为此，丰臣秀吉在内政方面，实施了诸项新政策。比如发布“刀狩令”，收交民间隐匿的武器；实行“检地”力图通过土地的丈量，集中掌握土地的所有权；统一度量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等。就在实施上述重要措施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第一，统一后实行丈量土地等政策，使大批武士脱离了农业，产生了许多失去土地的武士。另外，原来地方上拥有减免年贡特权的豪强，经过丈量土地，旧有特权大多被剥夺，引起了强烈不满。以地方豪强（日本称“国人”）和失去土地的武士为核心，在各地掀起了反丈量土地的一揆运动，使丰臣秀吉十分苦恼；第二，丰臣秀吉在统一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大商人的财力、物力上的支持，统一以后，他们企望依仗秀吉的权力，垄断贸易大权，尤其是垄断对外贸易大权。当时葡萄牙商人往来于澳门与日本之间，占据着贸易优势。为打破这种优势，真正实现日本大商人对外贸易权的垄断。唯一的办法就是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开辟日明之间的贸易。在新矛盾的激发下，丰臣秀吉

的个人野心也随之大发作，急急忙忙地发动了侵朝战争，致使古代中日之间发生第三次战争。饱尝战乱之苦的日本人民，生活刚刚安稳，又被拉入了战争的苦难深渊。

三次战争都是由统治者实行 错误的对外政策酿成的

对于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统治者说来，面临国内深刻的矛盾，总是要倾力于内政的治理。可是，为什么象中大兄皇子、忽必烈、丰臣秀吉这样的历史名人，却违反了上述常情，而推行黷武主义，把人民驱入战争的泥潭呢？这只有从他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和动机中才能寻找确切的答案。

一、中大兄皇子和唐高宗企图控制朝鲜半岛的错误政策，酿成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状态，随着新罗的强盛，这种局面已无法维持了。新罗国为兼并高句丽、百济两国，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而百济与高句丽联系密切，互相配合“屡出兵攻新罗”，致使百济与新罗结怨尤深^④。当时新罗与百济两国的力量比较，新罗强于百济。百济国因宫廷骄奢淫逸，官僚内部的争夺，以及人民的迁徙逃亡，国力日衰。新罗为了尽速攻灭百济，向唐朝乞援，唐高宗李渊怀着使邻国完全臣服于己的目的，决定接受新罗的求援，错误地采取了干预政策。660年，遣十三万水陆军卒，配合新罗军围攻百济，7月13日百济灭亡。

日本自公元645年建立大化新政权后，与朝鲜半岛三国的关系一直是正常的，每年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派遣使节通好，大化新政权方面也曾为关系的正常化而努力，曾表示：“既往短而将来

长，是故，可以温和之心相继往来。”^⑥但是，一旦新罗与唐朝的关系密切以后，却引起了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领导集团的不悦。朝臣巨势大臣，曾于公元656年奏请派兵讨伐新罗，他说：“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其伐之状。不须举力，自难波津至于筑紫海里，相接浮盈舳舻，召新罗问其罪者，可易得焉”^⑦，这是大化政权建立后，公开鼓吹出征朝鲜的首次言论。这里所说的“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的“必当有悔”，很明显是怕唐朝控制朝鲜，而影响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正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中大兄皇子等人，在公元660年百济灭亡之后，迅即决定接受百济遗臣扶余福信的乞求，扶植百济王子扶余丰为国王。后又派兵在朝鲜半岛登陆，兵分三路，讨伐新罗。妄图乘此机会，以援助百济为名，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在百济业已灭亡的情况下，企图死灰复燃本属妄想。因此，中大兄皇子为实现日本控制朝鲜的野心，“扶危继绝”，重建百济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忽必烈垂涎岛国的黄金，妄图胁迫日本臣服，最终激而成怒，发兵远征。

忽必烈所以在腹背夹击的困境中，发兵征日。其原因不外乎有二：其一，垂涎日本列岛的黄金。当时盛传日本是一个黄金国。忽必烈处于长年征战，百姓贫困，财源枯竭的境遇下，这种传说，不能不引起他的强烈欲望。当时留居中国约二十年，并在元朝政府中任职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回国后著述的《马可波罗行游记》中叙述：“忽必烈汗因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这一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忽必烈出兵日本的目的。其二，是忽必烈扩张野心的表露。忽必烈自1260年即大汗位，定年号为中统。公元1264年，取得对其弟阿里孛哥的胜利，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他在取得内部稳定之后，不断发动战争，南攻南宋，东征日本。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蒙古帝国版图横跨欧亚，西

起东欧，东至日本海。忽必烈以外交威胁和武力征伐对待日本，正是建立称霸世界的蒙古帝国的重要一环。

上述因素，促使忽必烈对日本的重视。并迅速地派出使节，督促日本臣服。1268年，兵部侍郎黑的持国书抵日。国书中首先指责日本未能向元朝贡。说“日本密迹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⑦，若不朝贡，则将诉诸武力，“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公元1269年12月，又遣赵良弼赴日，致日本国书的口气更为强硬，恰如通牒：“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⑧。对于忽必烈的通牒式的国书，日方认为“蒙古人怀有凶心窥视本朝”，朝廷和幕府一致予以拒绝。于是，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10月发兵东征，占对马岛，壹岐岛，登陆博多，宫崎，进击大宰府，遭日本人民的阻击，退守船舰。一日夜，适逢大风，“漂没蒙古战舰二百余艘”^⑨，惨败而归。之后，忽必烈移兵南宋，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1281年，忽必烈再次发兵攻日。兵分两路，一路由朝鲜出发；另一路由庆元（宁波）出发，遭到幕府武士的顽强抵抗。闰七月一日，又遇大风，“朔日大风动、使贼船多漂没”，“异贼多以损命，或被生虏。”^⑩据《癸辛杂识》续集载，死里逃生的兵卒说：（是日）至夜半，忽起大风，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仅存二百，全军十五万人仅归五分之一，弃粮五十万石。

三、丰臣秀吉为实现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两次出兵朝鲜。

关于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因爱子夭折，忧伤如狂，决定用对外战争来消愁；有的说，秀吉希望中日通交，但朝鲜不愿假道，致使他恼羞成怒，发兵征伐。

其实，丰臣秀吉的侵朝，是他统一日本后，社会矛盾的发展和他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日本统一以后所存在的社会矛盾变化已如前述。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丰臣秀吉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妄图统辖亚洲，建立丰臣秀吉氏的大日本帝国。

依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野心，产生颇早。据说在公元1578年，秀吉奉命率师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临发前，织田信长对他说：“我以播授汝，若尽心运策灭毛利氏，则中国（指今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悉授汝管辖，奋力呀，勿懈怠。”秀吉听后，则答称：“平中国势如破竹，臣速平中国……则分麾下群士，望赐（吾）九州管领，统治筑紫，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织田信长听后笑曰：“汝可谓大胆！”^⑩公元1585年，丰臣秀吉在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的时候，这样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之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讨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为此，采伐木材，造船舰二千，率军出征。”^⑪1587年，秀吉平定九州后，于5月9日，在给大阪城的家属的信中，再一次披露了他窥视中国和南洋各国的计划，“二三日内去鹿儿岛，处理国务，二十四、五日赴筑前国博多，直至大唐，南蛮国的港口。”^⑫1590年5月，秀吉致书朝鲜王李昖，扬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洲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

丰臣秀吉的上述称霸思想，由于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一直未能提上日程。然而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他便急不可待地付诸行动了。

当1592年的第一次侵朝战争，进军顺利的捷报传来的时候，丰臣秀吉欣喜若狂，满以为占领朝鲜已成定局，中国也垂手可得

了。5月，他从名古屋写信给远在京都的关白丰臣秀次，详细地叙述了统治中、朝、日三国的安排。他说：朝鲜陷落后，“予急需渡海，此行将直捣大唐国”；占领大唐以后，由秀次任大唐的宰相（日本称关白），日本天皇迁都北京，“（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贡圣上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秀次领有”；日本国内交由他人统治。6月，在给妻妾的信中更明确地说：他自己将“乘日本之船渡海，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奉圣意，占领天竺（印度）”。寥寥数语，野心毕露，这种利令智昏的野心，不但给中、朝人民带来了灾害，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战争之苦。

三次战争都加剧了侵略国的国内矛盾

如前所述，三次战争的发动，或出自侵占别国领土，或出自战争发动者的狂妄野心。但结果，没有一个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反而都陷入了矛盾的深渊，使原已确立的比较稳固的统治，也发生了动摇。如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由于派赋征兵，激起了广泛的反抗，湖、广、云、贵、浙、闽等地都不断地发生人民起义，致使元朝的统治极不稳定。这种因战争激化国内矛盾和削弱统治的表现尤为明显的是白村江战役后的日本政局，以及第三次中日战争中，丰臣秀吉的悲惨下场。

中大兄皇子的母亲齐明天皇，为了出兵朝鲜，扶持百济傀儡政权，661年不惜病弱老躯，亲赴九州督战，未及军兵出征，却病死九州。按照常规，作为皇太子的大兄应登基称帝，但因出兵朝鲜，后果尚难预卜，所以不敢贸然继位，只以“称制”之名行政。663年，白村江战役惨败后，中大兄一改以往改新进取的精神，在政策上趋向保守。这主要是害怕大化改新的反对派，借朝鲜战争的惨败，掀起新的反叛。为防止此等事情的发生，中大兄皇子于664年宣布了三项重要法令，第一，修改冠位制，把

649年制定的冠位十九阶，增至二十六阶，使更多的人有升进的机会；第二，给有势力的族长赐大刀，小氏的族长赐小刀，伴造等赐干楯、弓矢，承认他们的特权身份；第三，承认氏姓贵族的“民部”、“家部”，让氏姓贵族原来拥有尚未归公的部民，停止归公，允许仍然私有。这些灵活性的措施，目的就是要缓解白村江之战后日趋严重的贵族不满情绪。这正说明了白村江之战的惨败，导致了革新派和守旧势力之间矛盾的激化。白村江战役后，唐朝曾派遣以朝散大夫郭务棕为首的使团到达日本，这不能不引起日本统治者有所警惕。中大兄皇子未能及时继位的另一原因，正是他极其担忧唐、新罗联军乘胜追击，直捣日本，因此，从664年至667年，他化费巨资，先后筑起了四道防线^④。同样出于防卫的考虑，667年，把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可以说，中大兄皇子自663年至667年的五年间，是在惶惶不安的境况下度过的。如果说，白江村战役的惨败，给中大兄原已趋向稳固的统治，带来严重影响的话，那么，十六世纪末叶的两次侵朝战争，更使丰臣秀吉毕生拼战而夺得的霸主地位毁于一旦。丰臣秀吉原来认为挥师出征，必能速下朝鲜，进驻中国，但战局竟一拖七年。战事屡受挫折，将帅互疑，士卒厌战；战争负担过重，国内怨声载道；因战争延宕，各大名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分裂为主战和主和两大对立派别。丰臣秀吉忧忿成疾，1598年5月一病不起。原梦想成为亚洲霸主的丰臣秀吉命在旦夕。此时，他看到了大名势力的发展，大名之间的严重不和，以及嗣子年方七岁，一旦自己离世，丰臣氏就从霸主地位跌落下来的危险。秀吉出身微贱，爬上臣位实在不易。为保持自己一生拼战而获得的地位，秀吉不顾病笃在身，为其子丰臣秀赖继承大业费尽脑筋，要尽手腕。他让有势力的大名血盟誓言忠实于丰臣氏，并托事于德川家康五大志说：“愿秀赖平安成长，除此之外，（吾）死无憾事。”但是，长达七年的战

争耗尽了他的心血，也丧尽了他的权威，其临死挣扎，为时已晚。等他一死，号称全国大名之首的丰臣氏顷刻之间，便弹冠落地了。

三次战争都是违背中、日、朝人民 要睦邻友好的共同愿望

古代时期的三次战争，使三国人民，遭受战火的洗劫，其惨象目不忍睹。侵略者烧杀奸淫，无所不为。以丰臣秀吉的两次侵略战争为例，侵略战争使朝鲜人民处于贫病饥饿境地。据成书于1614年的《朝鲜》《芝峰类说》记载，当时朝鲜境内“白昼饥民相屠剪，以至父子夫妇相杀而食。逢疫病，道路死者相枕，水口门外积尸如山，高于城垒数丈。”又据随军僧的《日日记》载：“山野城廓，皆被火焚，人被杀戮，在腐朽的竹筒上，绑着人头”^⑮，丰臣秀吉曾指令侵略军，为显示战绩，可用人鼻、人耳为据，因此侵略军每到一地，便割人耳鼻，日本侵略者不但在朝涂炭生命，而且还掳掠百姓输送回国，充当苦力。据《日日记》载，当时随军赴朝的人口贩子，人数逾万，他们“随军深入，捕掠男女老幼，用绳缚头胫，串连而行，若立步不前，则遭棍仗鞭策。”

被侵略国人民罹难如此，而侵略国人民处境又怎样呢？试以忽必烈侵日时期为例，两次东征，使汉、朝、回回、蒙各族人民十余万人丧生。为了筹集水手，元朝政府在朝鲜、江、浙、闽、粤等地拉夫抓丁，甚至沿海一带私贩食盐者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皆是“习海道者”，以充任“水工，以征日本。”在元朝统治者蹂躏之下，朝鲜和中国江南人民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丁壮悉赴工役，老弱反得耕种，早旱晚水，禾不登场，国用凋敝，征日本需用大批船只，在准备第三次征日的过程中，朝廷“敕枢密院计胶、莱诸处漕船，高丽、江南诸处所造海舶，括庸江淮民船，备征日本”^⑯，

严重地妨碍民间农渔业和漕运。

深重的灾难，使中、朝、日三国人民不能忍耐，必然引起他们在各自的国度里，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

660年，当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日本统治者，应百济遗臣乞求，准备出兵朝鲜时，日本人民就曾诅咒战事必败，在民间广传如下童谣：

船舰正出航，缆绳互绕缠，
负载倾斜折，沉入大海洋。

船舰过海峡，循着航道行，
浪击舳舻断，沉入大海洋。

船舰循航路，你我同出征，
断裂舳与舻，沉入大海洋^⑦。

据史书记载，骏河国(今静冈县)人民，在建造征朝船只时，故意将舳舻装反。

在忽必烈侵日前后，中国人民不断有武装起义发生。“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⑧1280年，福建有陈桂龙及其侄陈吊眼起义，拥兵万余，据漳州，势及泉州，汀州等地。1281年，福建邵武县有高日新起义。1283年，广东新会县人林桂方等率众万余起义，建国号“罗平”。同年，福建有黄华起义，拥兵十万，得到人民广泛响应。公元1285年，广东潮、惠二州以郭逢贵为首的，一百五十余寨百姓起义，1287年，浙江婺州、温州、徽州等地百姓相继起而抗元。公元1288年，分别有广东的董贤举，湖南的詹一仔，广东循州(惠州)的钟明亮起义。据载，钟明亮“其势更盛，过于黄